



FOCUS

高层动态

2021年6月14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63.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本期目录

最新动向	3
【习近平：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李克强：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4
【栗战书：加强人大立法监督工作 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提供法治支撑】.....	5
【汪洋：确保边境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中不落伍 一个民族不掉队】.....	6
【赵乐际：深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	7
【韩正：扎实做好粮食和物资储备改革发展工作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7
【胡春华：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乡村振兴首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8
问题探射	9
【如何实现合意的制造业外移】.....	9
【中国迈向碳中和的难题与出路】.....	13
【土地出让收入划归税务部门征收背后的思考】.....	16
人物关注	19
【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调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19
智囊高参	20
【赵耀辉：完善积极支持政策 减轻生育养育负担】.....	20
【余淼杰：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重点和顺序】.....	21
虎视寰球	25
【欧盟能否应对疫情后的难民危机】.....	25
【全球税收改革方案应凝聚广泛共识】.....	27
【数百万剂要过期 美国疫苗进退两难】.....	28
华夏透视	30
【通胀并非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宏观政策应加大力度激发内需】.....	30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习近平：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青海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化改革开放，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

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青海的生态安全地位、国土安全地位、资源能源安全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结合实际、扬长避短，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和成果转化力度，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发创新活力。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承担起政治责任，统筹抓好财政、税收、审计等工作，严肃财经纪律，把各方面资金管好用好，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严格执行党中央关于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

习近平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要继续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强化政策支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要加强雪山冰川、江源流域、湖泊湿地、草原草甸、沙地荒漠等生态治理修复，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要积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综合整治水土流失，稳固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习近平指出，要坚守人民情怀，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以有效举措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就业、收入分配、教育、



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托育、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问题统筹解决好，妥善处理生态和民生的关系，实现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相协调。要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农畜产品标准化、绿色化生产，做大做强有机特色产业，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牧民素质，繁荣农牧区文化。习近平请青海省委和省政府转达他对玛多地震灾区各族群众的诚挚慰问，要求切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解群众难，安群众心，暖群众情，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习近平强调，青海是稳疆固藏的战略要地，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承担起主体责任。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各有特点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崇德，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一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广大党员、干部永远不能忘记入党时所作的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做到铁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二要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广大党员、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切实把造福人民作为最根本的职责。三要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广大党员、干部要慎微慎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确保党的肌体健康。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据新华社）

[Top](#)

【李克强：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确定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措施，更好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更优服务人民群众。

会议指出，“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了一批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引领性的重大工程项目，涉及科技攻关、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民生补短板、文化传承发展等重点领域。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序做好项目实施准备，细化实化支持政策，绝大部分项目陆续启动。当前国内外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要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针对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要求，要尊重经济规律，遵循市场化原则，统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惠民生、防风险，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在发挥好消费基础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一是加强前期工作。将“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落实到具体项目，优先纳入各领域规划，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分年有序推进，形成开工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对单体重大项目要倒排建设节点，对点多面广的打捆项目要突出重点、务求实效，



对建设难度大、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高的重大工程要深化勘察、方案比选和可行性研究。二是统筹中长期发展和年度经济运行，以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为重点，加强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合理把握今年明年投资力度，并根据形势变化适时合理调整。三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审批核准程序，减少不必要审批，保证项目尽早开工、资金高效使用。四是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更加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重大工程项目。五是强化督导协调，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对项目推进不力的要加强督促，及时解决建设中的问题。加强监管，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会议指出，广大医务人员守护着人民生命健康，在抗击疫情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要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保障医务人员合理薪酬待遇，进一步调动医务人员服务群众积极性。一是完善公立医院薪酬水平决定机制。有关部门要在确保群众就医整体负担不增加等基础上，动态调整公立医院薪酬水平。对公益任务重、承担科研教学任务等公立医院适当给予倾斜。各地要综合考虑不同层级不同性质医院工作量、服务质量等因素，合理增加薪酬总量。二是落实公立医院内部分配自主权。统筹考虑薪酬总量及相关因素，继续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也可结合实际，自主确定其他更加有效的内部分配模式，向关键和群众急需的岗位、业绩突出的医务人员等倾斜，推动更好解决大病重病等方面看病难问题。适当提高低年资医生薪酬水平，统筹考虑编内外人员薪酬待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据新华社）

[Top](#)

【栗战书：加强人大立法监督工作 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提供法治支撑】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6月10日下午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闭幕会。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栗战书作了讲话。栗战书说，本次常委会会议安排了21项议程，共审议12件法律和决定草案，通过了其中8件，听取审议国务院5个报告和1个执法检查报告，审查批准了2020年中央决算，作出1个决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栗战书指出，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数据安全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印花税法，修改了安全生产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作出关于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宣传解读等工作，抓紧制定完善配套规定，确保这8件法律和决定得到有效实施。

栗战书指出，加强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审计情况的监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定职责。要始终贯穿讲政治这一要求，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重大举措、重大项目等的财政支出和审计监督力度，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穿财政工作和审计监督全过程并转化为具体举措。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思想不放松，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严肃财经纪律、抓好审计整改，切实解决和杜绝屡查屡犯的问题。

栗战书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从国家立法层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各有关方面要全面实施好这部法律，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



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努力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栗战书强调，反外国制裁法的制定出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加快涉外立法的重要举措。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但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对于各种制裁和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坚决予以反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遵循国际惯例，借鉴外国相关做法，审议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为反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提供了法治支撑。要全面、正确理解法律规定，适时运用法律开展强有力的反制裁斗争。要加快推进涉外立法，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更好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据新华社）

[Top](#)

【汪洋：确保边境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中不落伍 一个民族不掉队】

全国政协近日在黑龙江开展“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党外委员专题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边境地区是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阵地，做好新时代兴边富民工作对于加快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深化睦邻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全面提高边境地区发展质量和水平，持续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确保边境地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落伍、一个民族不掉队。

6月6日至9日，汪洋与13位党外委员分成两个组，深入黑河、抚远、虎林、密山边境一线，考察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走访民族村落，看望少数民族群众，并在哈尔滨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情况介绍，交流视察体会和工作建议。委员们一致认为兴边富民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边疆治理的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高度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兴边富民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委员们围绕进一步做好兴边富民工作，从健全体制机制、加强政策支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人才培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角度提出了意见建议。

汪洋强调，推动新时代兴边富民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边境地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边境地区民族工作，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建设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党对边境地区工作的领导，搞好边境地区发展统筹规划，健全兴边富民工作机制，压实地方责任，汇聚强大合力。

汪洋指出，党外委员专题视察是十三届全国政协促进党外委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创新举措，是人民政协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制度性安排。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把专题视察活动坚持好发展好。（据新华社）

[Top](#)



【赵乐际：深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6月6日至8日到山东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深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切实提高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质量，更好地围绕现代化建设大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赵乐际先后来到东营市胜利石油工程公司、寿光市于家尧河村、济南市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深入车间、农户、蔬菜大棚，与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交谈交流，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听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建议。他指出，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既要靠组织推动解决，还要靠群众监督解决，注重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入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抓“四风”纠治，决不能让不正之风反弹回潮。对反复发生的问题要深入分析、找准症结，推动有关方面从制度机制上加以规范，促进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破立并重、纠树并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色，抵制奢靡享乐、铺张浪费行为。

调研期间，赵乐际到省纪委监委、省委巡视办，看望机关干部，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始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推进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的重要要求，赋予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重要职责使命，进一步指明深化“三不”一体推进目标方向。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系统观念，把“三不”一体推进方针全面贯彻到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增强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要注重运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视巡察的成果和经验，着力加强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不断提升“三不”一体推进治理成效。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换届工作要求，立足职能职责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重点把好廉洁关，坚决查处拉票贿选等行为，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赵乐际还瞻仰了济南战役纪念馆，强调纪检监察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把职责摆进去，贯通理解把握纪委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担负的责任使命，深入总结运用协助党委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扎实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据新华社）

[Top](#)

【韩正：扎实做好粮食和物资储备改革发展工作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6月7日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总结粮食和物资储备改革发展情况，研究部署有关重点工作。

韩正指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要站在全局高度，深刻认识粮食安全的重大意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扎实做好粮食和物资储备改革发展工作，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韩正在充分肯定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取得的成效后强调，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做好粮食和物资储备的总量确定、结构调整、品种选择、储备



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好粮食安全最根本的生产能力。

韩正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新建、改造和提升一批仓储设施，加强涉粮涉储关键技术研发。要运用好市场手段和政府调控手段，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千方百计增强储备能力。要把仓储领域的安全生产放到突出位置，完善相关管理体制，提高储备安全管理水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会前，韩正前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了解国家粮食交易平台运行有关情况；走进部分司局和处室，看望干部职工，了解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以及粮食应急保供等情况。（据新华社）

[Top](#)

【胡春华：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乡村振兴首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全国乡村振兴系统建设和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6 月 10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国乡村振兴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履行好新的重大历史使命，毫不松懈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个首要任务，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胡春华指出，将扶贫系统重组为乡村振兴系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极大加强，任务更加艰巨繁重。要优化整合机构职能，充分发挥加强“三农”工作的综合效应，协同推动乡村振兴。要执行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做好产业就业帮扶，落实兜底保障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抓紧把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抓起来，尽快熟悉业务，主动作为开展工作，因地制宜探索多种路径和模式。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坚持和发扬优良作风，打造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胡春华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乡村振兴系统的领导，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牵头抓总，统筹各方面力量，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据新华社）

[Top](#)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如何实现合意的制造业外移】

新冠疫情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可能减速，产业链的转移和重置成为当前经济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是国际生产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加控制的产业链转移会给中国带来显著的风险。

一方面，新冠疫情引发了外界“过于依赖中国产业链是否有危险”的讨论，促使一些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寻找供应商“备份”，将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部分国家甚至为此提供补贴。中美贸易摩擦后部分中资企业也有动力对外投资以规避贸易壁垒。如果制造业外移成为普遍现象，将对中国作为中间品出口国的地位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限制高科技和新兴行业出口，中国从其他国家购买中间品也面临一定风险。在新的约束条件下，中国针对制造业的政策重点何在，何种选择可能带来相对合意的转变，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先进国家的制造业外移：目的和取舍

制造业先进国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落后国家”曾经多次发生。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制造业大量转向德国，海外投资一度超过了英国国内投资。最近也最有名的例子是，去工业化使得欧洲和美国国内的部分产业和环节转出，先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国家建立生产基地，然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先进国家这样的选择保留了产业链上的高端链条，即技术密集程度高、产品价值增值度高、利润丰厚的环节，从好的方面看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坏的效果是，“产业升级”的另外一方面通常是投资母国的“产业空心化”，反映在数据上是制造业的产出、行业增加值、就业人数的下降。究其原因，资本的跨国流动较为容易，而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的流动性较低且国别之间的价差客观存在。资本逐利的特点使得企业总有动力将劳动力或资源密集的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降低成本是先进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主要目的。

先进国家企业的选择相当于在价值链和产业链之间进行了取舍。首先有必要区分这两个概念。价值链和产业链通常被当做同义词切换使用，但严格来说，“价



“价值链”关注对象是商品，区分的是不同要素投入，和要素的不同回报问题，默认的结论是通常来说持有技术和人力资本者获得的回报将高于仅仅凭劳动力获得的回报。“产业链”关注对象是企业，这个概念关注的是不同企业或者企业的不同部门生产不同的产品，或承担不同的生产环节的分工问题。先进国家的跨国公司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投资所获利润以投资回报的形式返回母国，跨国公司攫取了资本和技术要素的丰厚回报，保留了价值链的大头。同时跨国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低端生产环节和产业链的控制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回报在不同企业间的分配与企业对产业链的控制权大小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国际生产布局也确实会在一段时间中基本如母国所愿。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两者背离的情况也不罕见：当一家先进国家企业对投资目的地产业链的控制力下降，这将侵蚀其投资回报，如果投资回报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将意味着母国产业的空心化，国内生产能力的下降，失业的上升，并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德国承接英国制造业转移后逐渐取代英国，伴随着日本对外投资的国内经济空心化等现象，都是产业链控制力下降导致母国竞争力削弱的典型例子。

二、先进国家的制造业外移：中国所得

承接外国的产业转移是中国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始于 1979 年，当时中央决定建立广东和福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方针是：建设资金以吸引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选择这样的政策，其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内劳动力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这一点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而资本和技术均为当时中国欠缺的生产要素。当中国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想促进经济增长，实施赶超，面临的制约条件是储蓄不足、资本匮乏。吸引外国资本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中国有机会使用这些资金购买生产所需的设备与其他资本品，外资也能够获得高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对双方都是合算的买卖。中国将购得的资本品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生产得到的产品对外出口，获取利润与外汇。在其他多方面政策的配合下，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好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进口所需资金不再短缺，国内储蓄的上升为进一步的国内投资提供了可能，避免了借款这种负债形式，降低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外商资金流入中国，伴随着发达国家眼中“落后技术”的转移，也就是在发达国家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形成的“过剩产能”的转移，主要是制造业的转移。但这些技术和相关的管理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先进的，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促使中国生产效率提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出口导向+吸引 FDI”总体上被认为是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

上述过程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过程。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大部分用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比率水平来衡量中国价值链参与度的文章都支持这个结论。

三、外资转移下的中国制造业现状：亟需升级

虽然先进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和投资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但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部分制造行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亟需转型升级。分析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增加值、就业、资



本产出比等数据我们不难得到结论：中国的工业企业中，劳动力密集、中低端技术的企业仍然占据一个较高的比重。

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有多方面原因，早期对华投资的外商大量从事加工贸易是其中的一个原因。2011年的外资数据显示，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用于最终产品的比例高于内资企业，也就是说外企中从事劳动密集的加工贸易比重较高。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用于中间品的比例低于内资企业。即使外国跨国公司本身属于高技术高资本行业，在对华投资的早期阶段也主要投向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外企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外资企业针对中国劳动力密集行业的投资已经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因此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的动力不足。我们不在此文讨论中国制造业如何攀升价值链，以增强高端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问题。因为这涉及宏观管理的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另一个原因是中高端制造业是中国一定会努力发展的部分，这一点在国内的政策上和行动上有着广泛的共识。仅就外资而言，中国仍然欢迎外资流入，并鼓励其发挥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作用。中国对内资企业一视同仁，外企进入中国后和内资企业同样待遇，这是新《外商投资法》的精神，而绝不仅仅是停留在书面上的口号。中国经济和外资仍然彼此需求：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大多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固定资本形成，有实际的生产能力，培养了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虽然外资企业的技术能力还有相当数量保留在母国，但仍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中国国内的市场需求也为国外技术实现市场价值提供了可能性。

和四十年前不一样的是，除了外资的贡献，中国还需更加重视其他促使制造业升级的方法。即使目前美国对中国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联合盟友等方法试图将中国踢出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但中国仍然可以通过自主创新、与第三国合作等方式减缓美国限制的影响，提升本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

四、中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外移：另一挑战

目前中国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中低端制造型企业的转移问题，这个问题与制造业升级有同等的重要性。制造业对外投资和制造业外移不完全相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都视为转移，也就是说对外投资减少了国内的制造业投资，或者说对外投资是以减少国内投作为代价的。稍微精确一点的区分是，投资于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国家更大可能是制造业外移的情况。目前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特征可以归纳如下：

1. 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与制造业发展水平基本持平。2015-19年制造业占中国 ODI 的比重约为 30%左右，与制造业占中国 GDP 比重，以及制造业出口占比较为接近。

2. 中国对制造业外移比重集中在特定发展中国家。其中东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更是中国制造业外移的重要目的地。数据显示，中国对越南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制造业 ODI 的比重，约为越南占中国 ODI 比重的三倍。其他东盟国家也有中国制造业投资比重较高的情况。

3. 在讨论制造业外移问题时，外商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更值得关注。东盟国家的制造业的投资者主要来自于日本和新加坡。2012-18年，日本和新加坡并购东盟各国制造业企业的案例数，几乎十倍于中国的数量。中国整体的制造业外移中，外资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占一定的比重，值得特别关注。

4. 对东盟的投资外移主要来自中国传统制造业大省。目前中国对东盟投资



者主要来自浙江、江苏、广东等传统制造业大省，这在一定程度上和这些省份的制造业企业特点相关，例如民营企业多，中小型企业多，劳动密集程度高，对成本敏感，有一些环保程度不高的行业等等。总的来说，目前已有一些劳动力密集行业外移的趋势，其中需要特别关注外资企业转移投资的情况。在中国继续攀升价值链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大量外移，并带来利润和控制力的丧失，其结果是难以承受的。先进国家由于劳动力密集部门和环节转移到国外而给母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些教训可为中国提供借鉴。

五、对中国制造业外移的思考

在分析中国制造业优劣势的前提下，有意识地、主动地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分外移，在经济效果上将优于被动的、迫于情况变化而发生的、匆忙的制造业外移。为了实现合意的制造业外移，或许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政策设计：

（一）、工序细分

考虑对制造业各行业进行更细致的工序划分，以确定中国在不同工序中的比较优势。工序细分中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如何将制造业划分为：高端、中高端、中低端、低端技术制造业。第二个层面是，在四类的每一类中，再细分出高中低端的工序。第二个层面划分的标准是：增加值（或利润率水平）和控制力（或可替代性）。

这样划分的原因是：即使是中国的低端技术制造业或者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移，例如纺织服装业，也存在高端工序（设计、品牌、研发、销售），与中端工序（服装制造）与低端工序（纺织印染）的差异，针对不同工序的政策应该是不一样的。中国将各类制造型企业的低端部分，或者说纯劳动力密集的工序对外转移，其风险是可控的。系统梳理生产工序能便利中国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提高政策的精确度，避免对低端技术制造业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对制造业的工序细分关键在于保证“转出去”的产业能“回得来”。“回得来”的意思是，转移出去的工序需要帮助中国企业整体利润的提高，也指投资目标国的产品以中国为主要市场。

中国尤其要避免出现两种情况：某个制造业产业链整体的外迁，以及关键工序、原材料、零部件、工艺流程等的外迁。中国制造业开始具备独立升级的能力，是多个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投资目的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掌握了单个产业链的核心技术，本土企业积累了优势，有较大的市场需求等。中国建立独立生产能力的成功经验，在德国、美国、四小龙等国家的赶超阶段也曾屡次出现，这也是中国设计制造业对外投资政策时要避免出现的情况。

（二）、保障国内产业安全

中国在设计制造业外移的政策过程中，需同时考虑国内产业安全问题。中国需要梳理涉及国计民生、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健康相关制造业产能，以及保障国内特定时间供应所需保有的产能基本线。当某一行业的外迁导致国内产能下降接近基本线时，中国需要给出不同程度的预警。

中国需要利用这次机会，修改医疗卫生及其他国家安全相关制造业的法规或条款，应对美国的技术转移限制。疫情后发达国家可能促进医疗卫生等国家安全相关制造业的回流，对这些行业的跨国公司而言其投资决策将不完全是商业考虑，更可能是在国家安全压力下的选择。但发达国家需要提供财政补贴才能覆盖跨国公司成本的上升，甚至要修改国内法来约束企业才能达到预期目的。中国可



以通过类似的国内立法加以应对。

（三）、改善国内营商环境

维持并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关键在于改善国内企业的营商环境，增强中国对企业的吸引力。这一点对外资和内资企业都适用，中国需要进一步优化与良好营商环境存在客观差距，能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的项目。企业的成本包括人力、用地、能源、税费、物流、融资成本等。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客观存在，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密集行业或环节转移的趋势难以避免，或许可以通过精简办事手续，降低能源、用地成本，提高生产率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整体成本。

最有提升空间效果也最显著的选项可能是，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税费。税费高是降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税收仅占利润的25%左右，而2005-2018年中国税收占利润比的平均值约为70%，高税费成为拖累中国营商环境的最重要原因。中国降低税费空间较大，有可选的政策工具。

当然，产业链和工序都是快速变化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未来将不断出现新的高端环节，同样也有一部分高端将转变为中端，或者中端变为低端环节。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外移的关注点可能会发生变化。

（来源：“财经区域前沿观察”微信公众号，作者：潘圆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Top](#)

【中国迈向碳中和的难题与出路】

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宏伟目标。据估计，中国目前全年碳排放在100亿吨左右，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我们要在40年时间里把净碳排逐渐减少，最终归零。同时，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在85%左右，而且这个能源系统还将持续扩张，碳中和要求把这个系统倒过来。所以，未来清洁能源特别是风电、光伏能源，会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路径也是明确的。

那么碳中和与碳达峰又是什么关系呢？总的来说，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比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更具约束力。碳达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可以把峰值定得很高，之后再往下降就行。但是加上碳中和目标，特别是有时间节点的碳中和目标，碳达峰就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会导致峰值后的碳中和成本非常大。所以，为应对气候变化，碳中和更有约束力，也更有意义。

■碳中和路径清晰，但矛盾也突出

从全球来看，目前中国和全球的一次能源结构有共同点也有区别，比如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都占85%左右，包含煤炭、石油、天然气，区别在于：中国是煤炭占比达58%，燃气和石油占比较小，煤炭含碳最高，这也是中国目前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结构最大的特征。

未来，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变方式还是比较清晰的，中国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可能不会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而是以清洁能源为主，并且直接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替代的可能性更大。

正是基于低碳清洁转型要求，以及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特点，中国需要尽快大幅度减少煤炭消费占比。近几年能源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基本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减煤、控油、加气是短期化石能源结构转换的基本特征。令人意外的是，近



期煤炭替代过程中很大贡献来自天然气。当然，可再生能源贡献也很大。

对中国来说，现在减少煤炭消费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目标一致，大家对环境污染买单的积极性也在加大，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去执行相对容易。能源国企满足了中国家庭 80% 以上的能源消费需求，未来关键还是鼓励能源国企全面转型，只有它们转型，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低碳清洁转型。

进一步细看中国 2020 年的能源结构，不难发现中国的水电、风电、核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明显增长，但总盘子仍然不是很大。其中水电可能受制于水源潜能，核电主要是安全和布局问题、周期也比较长，很难在短期看到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足够大，才有可能满足大规模的能源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对煤炭的替代，才能可持续地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目前来看，传统能源消费还是会有所增长。

能源结构调整的上述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得到缓解，但是十四五规划期间仍会是较大矛盾。除了做好供给侧的工作，消费侧也非常重要。如何控制能源需求，也可以说是碳达峰乃至碳中和的必要条件。

■ 碳减排的关键是电力清洁

目前可再生能源基本上还是以电的形式体现。政府报告中经常提到风电、光伏电的装机量，数据规模很大，对环保的影响似乎很大，2020 年二者加起来有超过 24% 的装机量，但发电量加起来只占总电量的 9% 多一点，因为它们的利用小时比较低，贡献还比较少。反观其他可再生能源，核电是以 2% 的装机量贡献 5% 发电量，水电也以 17% 的装机量贡献 18% 发电量。剩下的主要还是火电，发电量仍然接近 68%，而且目前火电基本上就是煤电。

这样的电力供应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电力消费结构。由于电动汽车、氢能都依赖电力结构，电力结构干净它们就干净，否则即便它们得到普及，也不可能明显减少碳排放量。本质上，一个国家的电动汽车是否干净，主要取决于它的电力结构是否干净。氢能源也是如此。十四五规划期间，如果风电、光伏发电量没有很迅速地提升，电力需求增长也不降低，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的难题将依然存在。

近十年的电力消费数据则显示，火电利用小时数持续走低，这表明火电的地位随着光伏供电的增长在走弱。尽管光伏供电的利用小时数非常低，而且未来也不能高估其装机量增长对低碳转型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火电已经开始从供电主力慢慢转变，开始应用于对风电的备份、调控，未来还会朝这个方向走。如果基于十四五规划，合理推导未来电力需求增长的强弱情景，不同的电力消费增长对应的装机量和发电量会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具体而言，假设各类发电方式的平均年发电小时数不变，当电力需求年均增长 3% 时，到 2030 年火电的装机量会降到 47%，火电发电量约占 60%；当电力需求年均增长 5%，2030 年的火电装机量和发电量会分别占比 55% 和 68%。两种情景来看，2030 年火电依然是主力。

即便 2030 年风电、光伏装机量能达到 12 亿千瓦（现实中风电与光伏的发展速度可能要更快），而且政府也努力将电力消费增长控制在较低水平，并在加大力度推进光伏、风电的发展，坚持两手抓。届时，如果电力的需求增长太快，最终也很可能使我们 2030 年碳达峰时的峰值很高，后续碳中和的成本和时间压力会更大。只有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使可再生能源比例足够大时，才有可能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替代煤炭。

■ 建立以新能源为主的未来能源系统

未来我们的能源系统，政府明确指出要以清洁能源为主。我理解这个系统大概的框架，既包括光伏、风能核电、电动汽车、智能电网，也包括支撑性的火电



及碳捕捉利用与存储、储能系统、氢能。由于氢能不稳定，其发展与储能技术有较大的关联，需要把储能系统发展起来，剩余化石能源的碳排放，还必须有碳捕捉利用与存储做配套系统解决。

未来，储能和氢能的主要功能是将不稳定的大规模风电光伏变成稳定的能源。在此前提下，电动汽车将不仅仅具有清洁和石油替代特点，还可以成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电动机可以在用电低峰期间充电，所以可以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国大力度支持电动汽车，也与能源互联网、智慧能源、多能互补以及微电网的发展密切相关，主要是为了提高能源效率，保障用电安全。

火电必须控制和减少，这是共识。但是，中国庞大的火电系统退出造成的沉淀成本和转型成本都很高，要比较正面地看待火电。火电系统其实可以为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保驾护航。火电用作能源备份和调峰，尤其是在紧急时刻，比如大的自然灾害时刻，火电能起很大的作用。所以，清洁低碳转型并不是全盘否定火电在系统中的重要性。当然，技术方面怎么灵活地参与调控和调动，还需要深入探索。总之，即使到 2060 年，火电也可能还需要保留一些，通过 CCUS（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之一）解决其排放问题。

■碳中和难题的破解之道

实现碳中和目标要解决的难题，难度在于成本，技术进步是为了降低转型成本。

一、多用市场化手段

如果把电力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产品就是电，成本就需要反映在电价上。近几年电价一直没有上涨，管控较紧，因为电价跟粮食一样，影响面很大，从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追求角度考虑，只能稳电价，不敢轻易涨。其实政府仍然有可为的空间，比如通过碳交易和电价改革提升耗能成本。

电价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现实：气候越来越不稳定，电力系统由于大规模风电光伏介入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些因素都会推高电力系统供应的实际成本。对于电力系统来说，成本上升，电价稳定不动的话，电力系统将无法消化转型成本，要么靠政府补贴，但长期来看政府肯定吃不消；要么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抵消成本，但是空间也有限。因此，还是需要依靠相对市场化的手段解决转型成本。当然，市场化的手段不是简单地转嫁成本，而是通过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改变产业的格局，推进相关的改革。我目前比较看好碳交易市场和电力市场改革，使得碳价、电价都尽可能反映供需和成本，抑制需求，优化资源配置。

二、全面节能+全球应对

从需求侧来看，以往的节能目标主要还是围绕提高能源效率展开，比如降低单位 GDP 能耗。今后必须更明确节能的定义，包括提高清洁能源效能，以及循环经济。再下来是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的重工业部门，应该成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这些部门本身也要逐渐将碳中和成本纳入财务计算指标。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同贸易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碳中和也将通过全球化应对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进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全球化浪潮。贸易全球化主要基于经济利益，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化重在责任和贡献。而且，由于碳排放造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排放地，而是可以转移，所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全球化应对，逆全球化和贸易战即使不会改变碳中和政策的基本方向，也肯定会改变政策力度和速度。



三、消费者积极参与

中国目前的环保政策多倾向生产侧，这并不是说消费者不重要。生产和消费碳排放同样重要，政策之所以倾向于在生产侧发力，只是因为更容易些。如果能很好地控制人的消费需求，也能倒逼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消费侧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市场化制度下，如果消费者随着收入提升不断增加高耗能产品的消费，往往会在总体能耗量上抵消生产侧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使总排放量难以下降。可见，消费者控制消费，低碳消费，比如绿色出行，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让低碳消费成为趋势。不管对于企业或个人，如果把碳中和成本加进来，供需两侧都会影响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这需要提高全社会对于碳中和的认知力和执行力。政府的减排政策设计不能只抓住供给侧，也要兼顾消费侧。提升消费者低碳支付意愿，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责任，进而倒逼企业进行低碳生产，这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四、城市做先行者

最后，我也很希望一些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厦门等城市能够站出来，率先提出各自城市的碳中和目标节点。全国碳中和目标 2060 年实现，城市必须先于 2060 年。尽管现在越来越多企业，特别是轻能源企业，会站出来提出企业自身碳中和的时间节点。但是相比而言，城市的碳中和目标更有实践和政策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包含了消费者、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整体如何配合行动。城市要先行动，也因为大多数的碳排放来自城市，而且城市的激励措施容易进行，数字化程度也高，能更清晰地记录政策的成本和效果。总之，我始终认为城市应该做扎实的研究，能够负责任地站出来，提出自己城市的碳中和达标节点，并围绕碳中和从生产侧、消费侧、基础设施等方面率先开展系统性的工作。这既有很好的实践意义，还可以为其它城市今后的碳中和方案提供借鉴。

（来源：“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作者：林伯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 2007 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Top](#)

【土地出让收入划归税务部门征收背后的思考】

6月4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了《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一石激起千层浪，众说纷纭。这里谈一谈《通知》背后的考虑。因这四项政府非税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九成以上，所以《通知》基本上就是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专门作出的规定。所以这里仅仅讨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问题。

先说明几个事实：

一是中国的财政有“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894.9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54310.06亿元，非税收入28584.86亿元；地方本级收入100123.84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83315.3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93488.74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4142.29亿元，均为地方收入。

二是一般公共预算可以公开到类款，有些甚至可以查到项甚至目级科目，这是最近几年财政透明度推进的成果。但近几年土地出让金无论收还是支都只有一个总数，没有明细数据。2007年前，土地出让收入先纳入预算外专户管理，扣



除征地补偿和拆迁费用及土地开发支出等成本性支出后的余额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收入全额缴入地方国库，支出通过基金预算安排，实行“收支两条线”。尽管土地出让收支实行全额“收支两条线”管理，但土地出让后需要依法支付征地拆迁等成本补偿性费用后才是政府可用的财力这一事实没有改变。

三是自2010年起，财政部多次发布“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管理及使用情况”，直到2016年财政部官网发布《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以下简称《2015年收支情况》），列出土地出让金支出的具体数据，此后再也没有如此详细数据。因此，有必要对2015年数据进行简单梳理。

2015年，全国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33657.73亿元，同比下降21.6%。下降的原因不必多说，后面的2016-202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分别为35639.69亿元、49997.07亿元、62910.55亿元、70679.31亿元和84142.29亿元，我们看到了土地出让金增长势头强劲。

从《2015年收支情况》中，我们可将土地出让支出分为成本性支出和非成本性支出（即土地出让收益安排的支出）两大部分。其中成本性支出用于征地拆迁补偿、补助被征地农民、土地出让前期开发等，非成本性支出包括农业农村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城市建设等。《2015年收支情况》的数据简单说，成本性支出26844.59亿元，占支出总额比重79.6%，其中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和补助被征地农民、土地出让前期开发、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等其他支出等分别为成本性支出的66.81%、24.34%和8.85%；非成本性支出6883.19亿元，占支出总额20.41%，其中用于城市建设、农业农村、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分别占非成本性支出的36.73%、11.96%和51.31%。可以总结成下：

成本性支出	26844.59	79.59%	征地拆迁补偿和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	17935.82	66.81%
			土地开发支出	6533.9	24.34%
			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等其他支出	2374.87	8.85%
			小计	26844.59	100.00%
非成本性支出	6883.19	20.41%	农业农村支出	2528.17	36.73%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823.49	11.96%
			城市建设支出	3531.53	51.31%
合计	33727.78	100.00%	小计	6883.19	100.00%

《2015年收支情况》还罗列了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土地违法案件未得到彻底遏制，大多数违法用地未缴纳土地出让收入，造成土地出让收入流失；土地市场化配置比例偏低，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存在粗放利用现象，导致土地价值难以完全实现；一些地方仍存在减免或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通过空转等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和违规安排支出等问题，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经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看《通知》背后在考虑的问题：

一是划归税务部门征收要更加规范。近几年来已有多项非税收入征收划转至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如“五险一金”、水土保持补偿费、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排污权出让收入、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等近20项非税收入划转至税务机关征收，这是政府收支管理的一个趋势，也是发达国家的惯例。

二是此次划转是非税收入的征管改革，只是改变了土地出让金的征收部门和流程，土地出让活动组织实施、土地出让金归属和使用暂时没有发生变化。《通



知》明确，“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当然，由于原来土地出让金实际征收责任落在地方自然资源部门，由于自然资源部门征收手段、措施有限，就出现了《2015年收支情况》中罗列的问题。划转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帮助。与此相关的，历来与土地关联的经济案件也远远高于税务系统，此点无需赘述。

三是从数据看，土地出让金有接近八成的金额是以成本方式支出的，真正用来进行发展性收益安排的金额并不多。显然，目前土地出让金没有完全如税收一样入库收支，而是补偿与配套建设直接开支后余下的再统筹安排，尽管做到形式上的收支两条线，但实质上还是有“坐支”的性质。过去土地出让金的收缴部门都是政府的组成部门，政府随意性较大。划转后，税务系统的垂管系统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无论从实际收益还是从具体操作层面都会使地方政府受到更多制约，甚至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积极性。而这个结果可能正是本次改革乐于见到的。

四是国家层面希望掌握地方土地出让金情况，这样避免地方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谎报，同时还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予以干预。这一点的想像空间很大，会不会提高预算层次，加大管理力度甚至跨地区进行统一调配，现在难以预料。

五是土地出让是数十年的土地使用权。无论是40年还是70年，都远远超过每一届政府的任职年限，所以土地出让作为合法“寅吃卯粮”的手段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用后面的钱做今天的事的可能性。但可以预料，眼见城市化到一定程度，这样的做法可持续性值得担忧。所以，如果乐观一些，从长远来看，就土地出让金划归税务部门征收而言，可能有建立稳定持续的地方税体系的考虑。很多人在讨论这次划转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同样也因为政策的进一步走向不明确而难以有确定方向，甚至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经济或者供求关系的问题。（来源：澎湃新闻网，作者：龚刚敏，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Top](#)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调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调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据国务院国资委官方网站消息，6月8日，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十八指导组与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就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情况座谈，开展指导工作。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谭作钧出席座谈会。据了解，这是谭作钧首次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公开亮相。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谭作钧，1968年10月生，曾任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辽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2017年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据国务院国资委官网）

朱天舒任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

据《甘肃日报》消息，6月7日，兰州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和省关于兰州市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中央决定，朱天舒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省委研究决定，朱天舒同志任兰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中共兰州新区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兼）。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朱天舒，1968年5月生，曾任吉林省副省长等职，2019年出任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原任兰州市委书记的李荣灿今年4月已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据《甘肃日报》）

陈伟俊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据《新疆日报》消息，中共中央决定：陈伟俊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6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伟俊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陈伟俊，1966年6月生，长期在浙江省工作，曾任湖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等职，2019年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据《新疆日报》）

[Top](#)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赵耀辉：完善积极支持政策 减轻生育养育负担】

2021年5月31日，党中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并且提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支持生育的根本性政策转换。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3，这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水平。将生育数量扩展到三个孩子，表明了政府高度重视人口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并且决心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影响人口均衡发展方面的一系列严峻挑战。提出一整套保护和支持家庭、生育、妇女和儿童的配套措施则是最值得称赞的，是本次决策最有意义之处。

根据经济学理论，人们生育子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一方面是为了老有所依，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然而，生育孩子面临很多成本——妇女在怀孕和生产期间遭受身体和精神的痛苦、风险，家庭养育孩子期间发生额外的生活、教育费用等。经济学认为，与这些直接费用相比，生养孩子间接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这主要是妇女在生养孩子过程中需要放弃的工作收入。当孩子的收益降低，尤其是当社会养老保险普遍推行，使得养老越来越靠社会而不是依靠子女时，人们的生育意愿就会降低。同时，当孩子的成本提高，尤其是当女性越来越多地接受教育，从家庭走向社会，与男性一样在职场打拼时，生养子女的机会成本也相应提高。这两点是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下降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逐步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七十年代开始生育率就大幅度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是大趋势和全世界并无二致。

虽然孩子带给父母的使用价值降低，但是人类喜爱子女是天性。经济学认为，子女是正常消费品，即收入上涨时，需求上涨，需求反应在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上，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同时，在老年照料方面，来自子女的关爱是养老院无法完全替代的，即使在社会保障高度发达的国家，子女仍然是老年父母照料的主体。这就给各国政府提供了鼓励生育的政策空间。

如何鼓励生育，取决于我们对生育的成本，主要是间接成本的认知。首先是女性就业和收入的损失。很多研究发现，生孩子使母亲就业显著下降，而对父亲几乎没有影响。女性离开就业岗位之后，即使能够回到原单位，也由于技能的损失而无法与他人竞争，其收入损失持续一生。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政



策都是围绕着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展开，这些政策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延长产假，尤其是带薪产假，一类是提供育儿支持，如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研究发现，适当长度的产假，对于提高母亲就业，缩短两性工资差距有益，但是过长的产假反而有害，尤其是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加不利。已有研究还发现，产假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政府在托育方面的支出对于鼓励生育的作用非常明显。我国在 0-3 岁幼儿的托育服务方面十分欠缺，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政府提出大力推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同时我们建议特别应该鼓励和支持民办托育机构，适当降低准入标准，加强质量监督，以促进托育行业快速健康成长。

我国的教育体系也是造成育儿成本居高不下的的重要因素。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长期匮乏，导致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过早开展激烈竞争，一方面导致年轻父母焦虑感过高，增加亲子冲突，使得育儿所带来的幸福感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家长和学校都过分焦虑，使得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感受过多的压力，剥夺了儿童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快乐，造成了不少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些孩子成年后，在自身心理健康欠佳的情况下，很难发展亲密关系，不婚、恐婚现象增多，忌惮养育子女的重任。这个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大大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高优质大学和高中的数量和录取人数。为此，我国应该增加教育投资，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普及高中教育，降低公立小学、中学的班级规模，同时鼓励和支持各个阶段的民办教育，繁荣教育市场，满足多层次的教育需求。

生活成本过高也对家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大城市房价相对于工资过高。每个孩子都需要自己独立的卧室，从国际经验看，房价低的国家住房卧室数量多，生育率也比较高。我国应该适当放开房价高的城市的土地供应，以平抑房价，使得年轻人买得起住房，生得起孩子。

另外一个影响生育的因素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认为家务是女性的责任。当女性认为养育孩子的重任要一个人承担时，她自然会通过不生或者少生来表达她的抗议。为了提升生育率，有必要在全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尤其是鼓励和提倡男性做家务。当妻子承担了生育和养育的任务时，男性如果可以更多地承担家务，既可以改善夫妻关系，又可以享受多子的家庭幸福。

我国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没有必要悲观，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以采用，如建立一套廉价并且高质量的托育机构，增加住房供应以降低房价，大力提升高质量的教育服务的供给，以及在全社会提倡男女平等的文化氛围。这些政策虽然以鼓励生育为目的，但是其对于社会治理的价值更大，这是因为家庭、生育、女性和儿童的利益跟全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只要我国政府和民众足够重视，可以期望我国生育和养育负担得到实质性降低，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同时收获一个美好和谐、生机勃勃的社会。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赵耀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Top](#)

【余淼杰：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重点和顺序】

今天我简要地分享三个观点。一是未来中国在多边合作特别是 WTO 改革谈判中的关键点；二是在目前逆全球化思潮中，中国对外开放合作的重点和方向；三是中国未来对外开放的路径和顺序。



一、 中国在 WTO 改革中应坚守的关键

美方提出了 WTO 改革的方案，在这个方案里面哪些是中国可以让步的，哪些是必须坚守的，我们自己心里要有底。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坚持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应该是中国的底线。在谈这点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市场经济地位重要。打个比方，比如中国出口衬衣到美国，10 美元一件，美国认为太便宜，有“倾销”之嫌，通常会找与中国同是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作为第三国比较，假设印度衬衣的出口价为 20 美元，那么美国就可以以此作为依据对中国出口商征收 100% 的关税，把中国衬衣在美国的销售价格从 10 元提升到 20 元。这虽然只是个假设的例子，但现实中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税高达 97% 左右。但如果中国被成功界定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话，那么反倾销税就可以相应降低到 37% 左右。所以，是否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的出口来讲是很重要的。

美欧日之所以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主要的论据不外四个：一是关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否充分；二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作用和地位；三是中国是否存在以贬值为目标的“汇率操纵”；四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仔细研究下，其实这四点指责都站不住脚。

第一，中国的产品市场改革已经很彻底，跟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无太大差距。另一方面是我们已经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而且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国企和民企需一视同仁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反复强调。而从过去的二十年来看，“民进国退”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入世”之前，民营经济只占了中国经济很小的规模，只是国民经济“有益的补充”，但现在民营经济是占了中国经济“半壁江山”以上。有个“56789”现象就很好地印证了这点：民营企业创造了中国 50% 的 GDP，贡献了 60% 的税收，做出了 70% 的创新，创造了 80% 的就业岗位，企业数目也占了中国总企业数的 90%。

第二，国有企业不只是中国独有，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都有，而且也都是主要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上游产业。但并没有见到因为法国存在国有企业，而其他西方国家就认定法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至于强调对产业补贴要增加透明度的问题，这个也是中国一直认同并努力的方向。其实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同样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补贴透明度问题，所以也不能因为中国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进程而断定中国不是“市场经济”。

第三，中国从来都没有追求货币的贬值。事实上，从 2005 年到今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1 美元兑 8.27 元升值到 1 美元兑 6.4 元左右，已经升值近 25%。而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没有长期超过 4%，所以从这两个指标足以断定中方从来没有所谓的“汇率操纵”。

第四，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入水平不一，不能够用简单的“一刀切”原则对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应该采用差别付费的原则对待。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近两年来，连美方官方都承认中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所以，综合上述这四个方面看，中方都有足够的理由争取“市场经济”的地位。相对于“市场经济地位”而言，中方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自然，目前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年均收入 12,000 美元的标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自然可以据理力争。但平心而论，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争这个意义不大。理由很简单。中国现在年人均收入已到达 1 万美元，假设 WTO



的改革谈判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就算我们被成功界定为发展中国家，等谈判达成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发达国家。所以，目前看，争取发展中国家地位意义可能不是很突出。不如集中全力，做好谈判工作，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二、 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对外开放合作的重点

在未来世界发展格局中，全球化可能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区域合作将会取代全球化。理由其实也不难理解：

首先，WTO 提出一个新方案之后，这个方案很难放在四海皆准，或者让成员国都很满意。比如 WTO 的第九轮谈判-多哈回合，每两年一次召开的部长会议中提出的新方案，各方好谈的一下子就谈好，不好谈的还是谈不妥。目前多哈回合尽管完成了 90%左右的议题，但发达国家在取消农产品保护，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和金融贸易的市场准入开放方面，因为涉及到彼此的核心利益，都不愿意妥协让步。正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最后谈不妥，其他之前所取得的谈判成果其实边际作用就不会很明显。

其次，在之后的经贸合作中，一个国家尽管跟 200 多个国家或者经济地区做贸易，哪怕它积极参与 WTO，但对它而言最核心的利益还是与它紧密相关的经贸国家或者经济体，地区经贸协议对这个国家来讲更为重要。因此，区域全球化会优于全球的合作，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换言之，RCEP、CPTPP 还有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呈现三足鼎立态势。一个是中国制造为中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圈，其合作的区域自贸协议是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RCEP），一个是美国为中心节点的，主要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贸区，还有一个德国为主导的欧盟区。当然，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者孤立，三者之间还是有很强的经贸联系的，亚太经贸圈与北美自贸区的合作体现为全面进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中国跟欧盟的合作则体现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那么，假设未来世界朝区域全球化方向发展，中国未来开放应往哪个方向走？我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应该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开放的重点与方向。中国对外开放合作的重点其实是半球化，而不是全球化。半球化体现在中国跟东盟以及欧盟之间的经贸。换言之，在半球化发展过程中，中美之间的经贸应该会相对地被减弱，这可能也是国际大环境所决定的，也就是美国当前的战略格局。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短期之内还可以，甚至会有中美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但从长期上来看，特别是到十四五规划完成的时候，中美合作的空间跟前景都会相对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做好半球化的工作，也就是与东盟、欧盟之间的经贸合作。换言之，中国应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工作，特别是以东盟国家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诚然，我们要两条腿走路，积极推进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不过，关键是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因为地缘政治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与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合作目前还可能只能以简单的进出口贸易形式为主，而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合作则可以不只采用简单的进出口形式，还可以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直接投资。这是因为中国跟东盟这 10 个国家，甚至是与 RCEP 其他 14 个国家的贸易投资都远比中国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国家要强。事实上，RCEP 的协议中，就已经强调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15 个国家应该采取“负面清



单”与“正面清单”相结合的形式。总之，两条丝绸之路应该各有所侧重。

三、中国开放的“三部曲”顺序

我认为目前中国开放的路径和顺序可以分三步走：先推 RCEP，次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再推 CPTPP。关于 RCEP，目前各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进展顺利，自无需赘言。目前需要讨论的是：下来我们是先推中欧 CAI，还是 CPTPP？自然，我们可以两手抓，齐头并进。但其实心里应该明白：从时间表上看，中国 CAI 应该比 CPTPP 更容易谈妥。

这是因为尽管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目前碰到一些“回头浪”上，碰到一些挫折。但从本质上看，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份平衡、互利共赢的协定，不是谁对谁的恩赐。欧盟某种角度比中国还需要对方的市场。给定受疫情负面冲击欧盟经济疲软这个事实，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欧盟其实非常需要中国的合作。尽管从短期看，欧盟在政治上站错队，被拜登当局“忽悠”，出现了跟中国“政冷经冷”的局面，但笔者判断，不出半年，到今年年底，欧盟议会应会主动与我方接触，重启中欧投资协议谈判。反过来看，中国在短期之内要马上进入 CPTPP 其实难度很大。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 CPTPP 太过于着重成员国之间贸易规则的统一性，相对于 RCEP 而言缺乏灵活性。而中国在劳工、环境、国企领域的看法与 CPTPP 目前的成员国（特别是日本）并不一致。所以，如果按照日本认同的贸易规则，那么还是需要一定的谈判时间的。

第二，我的判断是，拜登政府不出半年有可能会紧锣密鼓地申请重返 TPP。如果拜登政府重返 CPTPP，中国成功进入 CPTPP 的难度会加大。比如说美国会在国企，还有劳工环境方面设置很高的障碍。可以理性预测，美国先于中国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很高。而一旦美国先于中国加入，中国再进入 CPTPP 的难度就会加剧，他们可以在协议之后再设立别的门槛，或者协议文本解释也是由他们解释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在美国之后加入 CPTPP 相对比较困难。

相反，如果中国先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然后假设一两年之内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能够达成，那时中国对 CPTPP 就保持着一种开放平和的态度，不着急地慢慢谈判。当然我们希望尽快谈成，但是成不成也不取决于中国。中国要做好准备，包括改革、宣传，还有心理方面的准备，尽人事安天命。等到中欧投资协定签署后，我觉得 CPTPP 可能甚至会为中国量身定做一些协定，到那时中国加入 CPTPP 就更加水到渠成。

总之，中国在未来 WTO 的谈判中，关键是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对外开放的重点。从开放顺序上看，宜先 RCEP，次中欧 CAI，再冲 CPTPP。

（来源：网易研究局，作者：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

[Top](#)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欧盟能否应对疫情后的难民危机】

近些年来，欧盟一直被难民危机所困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盟多国采取封锁边境、取消航班等防疫措施，一度使非法移民数量有所下降；但随着欧洲疫情好转、防疫措施放松以及春夏气温回升，非法偷渡的难民数量显著回升。根据欧盟边境管理局和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2021年4月的非法移民数量是2020年同期的4倍，今年以来已有743名非法移民在偷渡欧洲的过程中溺亡，这一数字是2020年的3倍之多。此间有舆论惊呼：欧盟的“难民危机2.0”已经迫在眉睫。

欧洲媒体对当前的难民问题形势尤其是难民进入欧洲的路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难民偷渡发生最多的是“中地中海路线”，即从北非经过地中海中部偷渡到意大利南部或马耳他。今年以来，该路线发生的偷渡案件是2020年同期的两倍多，今年溺亡的743名非法移民中有632人在该路线上死于非命，可谓名副其实的“死亡路线”。分析认为，此路线成为主要路线有两个原因：一是北非最大的难民来源国之一利比亚尽管与意大利及欧盟达成了相关协议，但该国政府对国家的管制能力不足，尤其是该国沿海地区主要被民兵组织控制，而民兵组织正是组织偷渡的主力军；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重创非洲经济，加重了非法移民偷渡的趋势。

其次是“西地中海路线”，是指从地中海西部的北非国家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的路线。尽管西班牙与摩洛哥两国官方也有相关协议，且西班牙每年给予摩洛哥大量的资金援助，但摩洛哥还是将难民作为处理对西班牙关系的一张牌来打。前不久，推动西撒哈拉独立的“波利萨利奥阵线”领导人之一被发现在西班牙的医院治病，而“波利萨利奥阵线”长期以来一直被摩洛哥政府视为分裂势力。作为反制措施，摩洛哥宣布放松边境管制，于是短短数天内超过9000名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修达，目前局势尚未有缓和迹象，欧盟相关机构已经在评估派遣欧盟边防警察前往修达的可行性。

最后是2015年难民危机高潮时最受难民青睐的非法移民路线——“巴尔干路线”，是指从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家经过土耳其、希腊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的路线。随着欧盟与土耳其在2016年签订了相关条约，加上斯洛文尼亚、克罗



地及塞尔维亚等国加强了边境管控，“巴尔干路线”上的非法移民一度得到控制。但近年来，中东非法移民又开发了一条“新巴尔干路线”——绕过土耳其直接从阿尔巴尼亚以及黑山、波黑等巴尔干国家进入克罗地亚或意大利，进而转进到其他欧盟国家。

面对严峻的难民形势，欧盟目前仍然没有比较明确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国一致同意以援助难民输出国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但想要在欧盟内部协调各国共同处理难民问题，形成统一的程序和标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东欧“喊穷”，北欧“高冷”，地中海沿岸国家不堪其扰，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一线国家”首当其冲，一直抱怨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缺乏团结。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呼吁欧盟针对当前的难民形势对地中海国家制定“可持续的、公平的支持方案”，然而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疫情之后，欧盟各成员国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对德拉吉的呼吁反响寥寥，在日前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难民问题甚至没有被纳入会议日程。面对这种局面，意大利只能单方面向欧盟施压寻求解决方案。媒体报道称，目前欧盟初步计划以2016年与土耳其的难民协议为样板，与突尼斯和利比亚两国签订类似协议以限制难民输出。内容包括欧盟向两国提供经济援助来改善边境管理条件，扩建难民营；上述两国有责任阻止非法移民前往欧洲，对于已经抵达欧洲的非法移民将简化手续、遣返原籍国；双方共同打击偷渡行为等。

选择这两个国家作为缔约对象，是因为近年来这两国已经成为欧洲难民的主要来源国。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今年非法偷渡到意大利的13100名难民中，有9000名来自利比亚，3000名来自突尼斯。利比亚是非法移民前往欧洲最大的中转国，目前仍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万难民在利比亚等待着前往欧洲的机会。突尼斯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有三分之一前往欧洲的偷渡船只是从突尼斯出发的。对于欧盟来说，“花钱消灾”自然是最简单的办法，而对于饱受“颜色革命”创伤且经济形势常年低迷的突尼斯和利比亚而言，能够获得欧盟的大额经济援助也不失为一笔划算的买卖。根据欧盟方面的消息，相关谈判工作已经展开。日前，意大利内政部长拉莫尔杰赛和欧盟难民事务专员约翰逊共同访问了突尼斯，拉莫尔杰赛称访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双方预计不久可以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除了缔结新约，欧盟还面临着与土耳其续约的工作，因为双方2016年签订的难民协议将于今年6月到期。2016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倡议下，欧盟与土耳其签订了为期5年的难民协议，规定土耳其负责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阻挡在欧盟边境之外，而欧盟向土耳其拨款60亿欧元用于安置难民。根据欧盟外交圈的消息，按照新的协议，欧盟可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每年向土耳其多支付数亿欧元的安置费用，欧盟计划在6月底的欧盟-土耳其峰会上与土方开展谈判，并在今年10月份完成续约。

有关专家针对欧盟的难民局势提出了建议。国际移民组织欧盟分部发言人瑞安·施罗德表示，欧盟应从宏观和长远的视角看待难民问题，将难民问题放在疫后经济恢复的大背景下解决，实现人员安全、有序、包容性流动，并保障难民和移民权利。欧洲移民政策研究所所长汉妮·贝伦斯认为，欧洲仍有动力接纳难民和移民。受疫情影响，欧洲国家农业、制造业短期工人缺口增加，这客观说明很多国家仍需外来劳动力。同时，接纳难民应该从长远考虑，制定长远规划。欧盟能否顺利应对疫情过后的“难民危机2.0”，仍有待时间检验。

（据《光明日报》）

[Top](#)



【全球税收改革方案应凝聚广泛共识】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日前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通过了一项“全球税收改革方案”。美、日、英、法、德、意、加七国财长呼吁“大型高科技跨国企业”在其经营业务的国家纳税，最低企业税率为15%，以此反避税和彰显“公平竞争”原则。“全球税收改革方案”是本次七国财长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会议表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大幅上升，不同的税收制度导致吸引外资出现了不正当竞争。会议出台的税收改革方案要求大型跨国公司在其总部所在地纳税的同时，还必须在运营的国家纳税，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打击避税。

当前的国际税收规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按照现行规则，实体企业在哪里就在那里缴税。但近几十年来，大型跨国公司选择在低税率管辖区注册，将大量利润从高税率管辖区转移以避税。据联合国估计，跨国公司转移利润导致各国政府每年损失的税收高达500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本次七国财政会议推出的税收改革方案一旦实施，意味着大型跨国公司难以利用各国不同的税收政策来避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七国集团财长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所未有的承诺，为实现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全球最低企业税将结束国际上的低税竞争，为各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全球经济繁荣。

自从披露诸多跨国公司和个人避税信息的“卢森堡泄密案”和“巴拿马文件”公开以来，各国对因税收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高度关注。拜登上台以后，力推多项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主张通过向富人征税来筹集资金。此间分析人士认为，七国财长的方案只是全球最低企业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法国财长勒梅尔承认，各国在未来几个月将就税收额度问题展开更加激烈的讨论。经合组织总干事克尔曼说，七国财长的方案虽然不是最后方案，但为后面的讨论奠定了基础，经合组织139个成员将进一步展开讨论，让跨国公司“付出应该支付的税收额”。有非政府组织表示，15%的最低企业税率还不够，应该提高到25%才能真正解决跨国公司避税问题。

全球税收改革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牵涉面广，需要经过各国认真磋商，甚至是通过政治决断来达成协议。有分析人士指出，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问题，各国国情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不同，对税收的政策主张自然各异。在七国财长会后，欧元区主席多诺霍以爱尔兰财长的身份发推文称：“经合组织有139个国家在谈判税收问题。所有的协议都应该兼顾和满足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不能仅仅满足七个发达国家的愿望。”爱尔兰的企业税率为12.5%，所以公开反对七国财长的方案。

七国财长会议对外自诩讨论税收改革是为了实现“公平竞争”，但关起门来又极力为本国寻求“网开一面”。据悉，在七国财长会议上，加拿大曾提出采掘业例外原则，英国希望将金融业“置之于外”。这不能不令人思考，涉及各国重大利益的税收问题，仅由七国财长会议来主导是否合适。

在西方经济整体处于低迷状态的当今世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许多重大决策缺少中、俄、印等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妥善处理的。“全球税收改革方案”绝不是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可以为其他国家越俎代庖的。此次七国财长会议推出的“全球税收改革方案”只是“暂时的”，今年7月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以及10月举行的G20峰会才是探讨这一问题更合适的平台。（据《光明日报》）



【数百万剂要过期 美国疫苗进退两难】

一面是要过期的库存，一面是跟不上的速度，美国的疫苗接种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不过比起供过于求，更棘手的是民众的接种意愿持续走低，总统拜登当初定下的接种目标看来也无法实现了。而对外，虽然拜登终于松口与世界共享疫苗，但最快也是下半年的事了。

■快过期的风险

在全力扩大产能提速接种后，美国的疫苗工作遇到了麻烦。当地时间6月9日，据《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数百万剂强生新冠疫苗的有效期将在6月到期，而其中有一大部分可能会变质。美国许多州政府称，他们未能把数十万剂有效期将在6月到期的疫苗及时进行分配。

美国俄亥俄州州长狄怀恩表示，该州有20万剂强生疫苗将于6月23日过期；阿肯色州也指出，按照目前施打速度，该州最后将有6万剂强生疫苗来不及使用。而放眼美国全国，根据CDC的资料，强生公司已对美国国内提供约2140万剂疫苗，其中仅约1111万剂疫苗已施打。

报道还指出，在缺乏联邦政府协调下，各州“滞销”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剂强生疫苗将面临过期，无法在对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作用。美国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小组顾问安迪·斯拉维特（Andy Slavitt）在6月8日举行的简报会上证实，发放给各州的一部分强生新冠疫苗“有过期风险”。

当前，美国也在为协调这些快过期的疫苗做着努力。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俄克拉何马州卫生部门官员基思·里德称，卫生部门已经“把过期疫苗从现有库存储取出，正依照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恰当处理指南操作”。

但里德补充道，除已报废的数千剂新冠疫苗，还有约8万剂强生新冠疫苗本月底将到期。同时，各州卫生官员已经呼吁联邦政府批准协调国内疫苗重新分配。斯拉维特称，订购和施打疫苗都是各州的责任，将尽力让疫苗不被浪费，并称FDA正研究如何延长疫苗的保存期限。

■接种未及预期

按照俄克拉何马州卫生部门的说法，过期原因在于单日接种量从8000剂降至4500剂，疫苗用不完。“接种量稳步下降，有些令人担忧，”里德说，“我们无法达到想要达到的目标。”疫苗专家陶黎纳分析道，此番疫苗过期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强生疫苗自身有效期较短。虽然强生疫苗仅须接种一剂便能获得完整保护力，但保存期限仅有3个月，此外强生对保存和运输的条件也较为苛刻。

“第二则是民众接种意愿不足，导致库存积压。”陶黎纳谈到。很多美国人还是秉持“反疫苗”的想法，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种的。有一部分人“反疫苗”的发言确实让人大跌眼镜。6月8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健康委员会会议上，一名反疫苗的医生甚至宣称，COVID-19疫苗可能含有金属成分，会使注射疫苗者身体“磁化”，可与5G信号塔进行交互。除了上述原因，疫苗的过期或许还有此前“血栓风波”的影响。今年4月，由于有民众在施打强生疫苗后出现血栓及血小板数量减少的症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一度宣布暂停施打强生疫苗。

美国官员透露，经过此事件后，许多美国民众不愿意接种强生疫苗，施打数



量较4月最高峰时降低了67%。即使目前已重新开放施打，许多美国民众仍不愿意接种。民众接种意愿的下降，也直接导致了美国整体疫苗推进不及预期。拜登先前设定目标，打算在7月4日独立日假期前让美国70%的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同时大约1.6亿人完成接种。

但以目前的接种速度来看，拜登的目标似乎难以实现。据统计，美国最近日均疫苗接种人数从两个月前的接近200万人减少至40万人。而如果要达到拜登设定的目标，美国大约1550万名成年人需要在今后四周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8日，美国已经接种超过3亿剂新冠疫苗。大约63.8%的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53.1%的成年人完成接种。美联社报道称，民众对疫苗的疑虑、疫情好转使得民众放松警惕等原因导致接种难以达标。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6月8日在一场记者会上说，他仍然希望完成接种目标。“如果没有实现目标，我们将继续推动。”

■松口共享疫苗

面对着将要过期的疫苗，除了在各州内部之间协调，美国也有想供往海外的打算。西弗吉尼亚州的新冠疫情应对官员马什表示，正在与白宫、CDC等合作，寻找是否能与美国国内外的其他机构分享这些疫苗以使用。他强调，各州需要联邦政府的许可、协调和执行能力，才有办法将多余疫苗提供给其他有需求的国家。

但CNBC报道称，因为所剩时间太短，因而美国政府既难以在国内使用这些疫苗，也难以将其转移给疫苗紧缺的其他国家。陶黎纳也对此表示，目前把眼下快过期的疫苗共享出去不太现实，即便是给较近的国家，运输、施打都还需要时间。不过，在这批疫苗无法运往海外的同时，美国也开始履行此前的承诺，向世界共享疫苗。当地时间6月9日，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将购买5亿剂辉瑞疫苗并在未来两年内将其捐献给全球近100个国家。不过，这项计划还尚需一些时间。CNBC报道称，美国将于今年下半年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向全球近100个国家分享其中的2亿剂，并在2022年上半年捐赠剩下的份额。该知情人士称，拜登可能会于11-13日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据北京商报）

[Top](#)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把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通胀并非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宏观政策应加大力度激发内需】

2021年初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修复，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8.3%。特别是供给端的工业增加值，一季度不变价同比增速升至24.4%，需求端人民币计值的出口名义同比增速为38.7%。

刚刚发布的4月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延续了这种强劲恢复态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考虑到去年同期复工复产加快、基数抬高影响，当前同比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是一个较高增速水平。同时，4月人民币计值的出口同比增速达到22.2%，甚至比3月的20.7%更高。

从当前的内外环境来看，工业生产和出口增长势头较强，同时全球流动性宽松、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了一定通胀压力。政策讨论当中，对于是否“转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否需要“转弯”？观察当前增长形势，必须要考虑疫情冲击、中美关系这些背景。同时，对于中近期的宏观调控框架进行讨论，也需要从中长期新发展格局的视角进行思考。

一、下半年出口增速将出现回落

图1：疫情以来外需扩张持续强于内需





当前中国经济在生产端体现出来的第二产业强于第三产业，这与疫情零星冲击下服务业面临限制有关，也和需求端出口贸易较强高度一致。在各种观点当中，对下半年经济仍然比较乐观的看法和较强的出口需求有关。但是我们认为，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在下半年可能会有所减弱，尤其在四季度可能回落较快。

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是，去年下半年出口的基数较高。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强劲的外需和海外市场的供求缺口有关。一方面欧美的宽松政策和对个人的大力救助，使得总需求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海外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中国的出口持续走强。

海外市场供求力量的这种对比情况，在 2021 年下半年可能会发生转变。

第一，在疫情期间，由于社交距离的限制，欧美居民的旅游、餐饮等服务业需求显著下降，而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相对稳定。因此，在下半年欧美疫苗实现普及的过程中，其需求恢复主要体现在服务业或不可贸易品部门，而不是体现在制造业这类可贸易品部门。

第二，下半年欧美实现疫苗普及以及对个人救助政策到期之后，欧美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将显著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失业率有同步下降），从而欧美国家的供给、需求缺口将有显著缩小。以美国为例，在 2020 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为 6.49%，是 1989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甚至高于 2000 年（6.47%）。在救助政策支撑下，个人就业意愿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但是在基准情形下，下半年美国疫情预计将得到控制，并且 2021 年 9 月美国个人救助政策到期后基本上不会再延续。届时美国的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劳动参与率也将显著上升，其供求缺口将明显收缩。而中国的外部需求也将有相应的回落。当前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显著超出过去的历史最高水平，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出口份额出现回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需要稳住内需，从而对出口增速的回落提供缓冲，避免因为出口的波动而影响到国内经济稳定。

二、过度依赖出口不可取 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即使出口增速维持高位，甚至超预期走强，这也不是可取的增长方式。“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2020 年初疫情冲击之前的较长时期，中国内需增速持续快于外需，外需对经济产出的贡献持续下降。但是疫情冲击之后，外需经历短暂下行之后出现了强烈反弹。2020 年二季度到 2021 年一季度，外需增速、内需增速差值越来越大。我们将出口作为外需、GDP 减去出口值作为内需。2020 年二季度，外需增速比内需增速高出 1.3 个百分点（4.2%减 2.9%），2021 年三季度两者差值扩大到 20.9%（38.7%减 17.8%）。尽管上年的基期效应有一定解释力，但仍然难以完全解释这种内外需增速的背离。

其中对于出口贸易增速大幅上升的原因分析较多，一方面这与疫情相关的医用产品出口有关，一方面与前文提到的海外供、求缺口有关。其自然的结果是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创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大幅上升。2020 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为 5269 亿美元（海关口径），较疫情之前的 2019 年上升了 1059 亿美元。2021 年前四个月贸易顺差已经达到 1579 亿美元。

相应地，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程度有所上升。2016 年至 2019 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例一直维持在 2% 以下。2020 年前低后高，后三个季度的经常账户顺差 GDP 占比在 2.4% 到 3.1% 之间，2021 年一季度这一占比预计也将达到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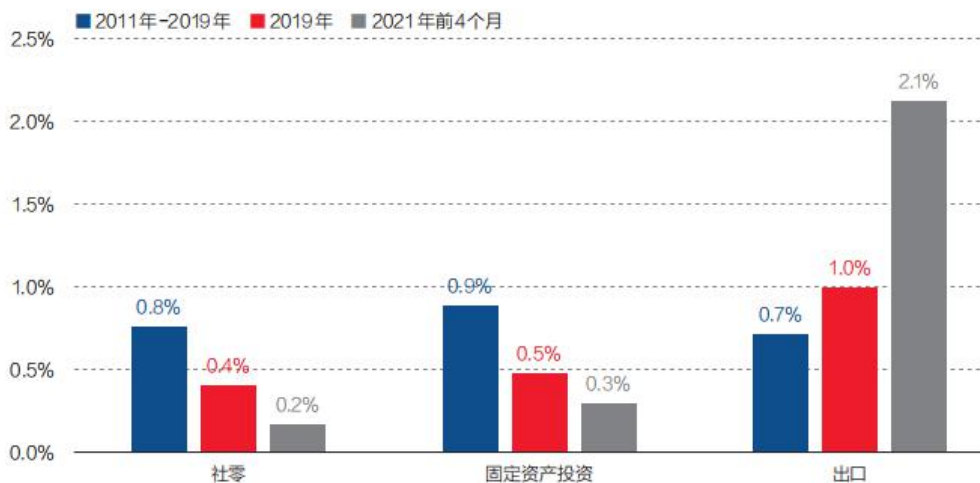
左右。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加剧，美国就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可能性上升，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也可能会上升。

同时，经常项下大幅顺差的镜像结果，便是资本与金融项下中国海外资产的增加。这有一定积极意义，疫情期间确实是加大对外关键产业、技术投资的机遇期。但是，经常项下巨额顺差所对应的海外资产大幅增加，这一点也带来了下面三点隐忧和风险：其一，在中美冲突背景之下，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面临一定政治风险。其二，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的过度宽松货币政策也使得海外资产的投资收益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其三，更多的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仍陷于疫情的困扰之中。

事实上在 2020 年，中国经常账户中的投资项净收益为-1071 亿美元，较之前的年份有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追求出口和顺差的大幅增长，这不应成为中国的宏观政策目标。即使出口增速持续走强，我们也不宜回到过度依赖外需的老路上去。稳定就业和经济增长，更多要着眼于扩大内需战略。

三、内需依然偏弱 需宏观调控政策加力

图 2：主要指标月度季调环比、实际增速平均值：三个时期的对比



从同比来看，内需增速似乎已经走出了疫情冲击的阴影。2020 年二季度中国内需名义值同比增长 1.6%，实现了正增长，之后逐步回升，到 2021 年一季度中国内需名义同比增速为 18%。但是疫情冲击带来了较强干扰，使得同比增速受到基期效应的较大影响，因此我们使用月度季调环比增速（实际值口径）来观察 2021 年前四个月的主要经济指标，并将其与疫情之前的增速情况进行对比。

首先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指标在 2021 年 1 月至 4 月的季调环比、实际增速平均值为 0.2%，低于疫情之前的 2019 年平均值（0.4%），更低于有数据以来 2011 年至 2019 年的月度均值（0.8%）。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其在三个时期的表现与前者完全一致。而出口增速则与前两者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2021 年 1 月至 4 月的季调环比实际增速平均值为 2.1%，大幅高于 2019 年的平均值（1.0%），更是高于 2011 年至 2019 年平均增速（0.7%）。

因此，从季调环比增速的平均值角度来看，2021 年前四个月的内需表现明显弱于疫情之前的常态，而出口部门的表现则相反。可见，尽管当前的社零、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尚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季调环比增速以及考虑了物价因素



的实际口径显示，内需不但显著弱于外需表现，而且也弱于疫情之前的常态表现。在此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有必要加力而不是过快地“转弯”。

四、2021 年中国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

图3: 液态燃料的全球生产、消费力量对比



从市场预期来看，2021 年物价上涨压力主要体现在生产端，而在消费端的物价涨幅压力较小。WIND 综合预测显示，市场预期认为 PPI 全年涨幅在 4%—5% 之间，而 CPI 通胀率全年涨幅将明显低于政府工作报告中 3% 左右的预期目标。从趋势上来看，CPI、PPI 通胀率同比涨幅都将在年中达到高点，并在下半年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其中生产端的通胀压力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关。大宗商品价格的后续走势对于判断通胀的走向比较关键。和疫情之前对比，2021 年一季度的液态燃料全球消费量、生产量均显著低于 2019 年水平（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但是 2021 年一季度的能源价格已经高于 2019 年水平。

疫情前后，液态能源的消费量下降而价格上升——这表明和疫情之前相比，当前的能源价格上涨具有一定的供给冲击属性（例如 OPEC 限产政策）。这和需求冲击主导的性质有所不同，宏观调控政策对这种性质的物价上涨需要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如果观察疫情之后的形势则可以看到：2020 年中期至 2021 年一季度，液态燃料（包括石油在内）的全球消费量持续大于全球生产量。这一需求缺口导致能源价格总体维持上涨。而且根据预测值，需求缺口还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直至在下半年收窄并基本消失。在此期间，能源价格上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下半年压力将有显著缓解。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在不同程度上也具有这种特点，这也意味着本轮生产成本上升具有暂时性特征。

当然，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因素很多，除了供求关系之外，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带来了金融市场的扰动，还有地缘政治因素等等。但是美联储去年推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现在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滞后期，而且宽松政策的预期在边际上也出现了一些纠结的变化。总体而言，全球流动性宽松的力度已经见顶。进入下半年之后，支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动能将会受到显著削弱。

还有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是，4 月美国 CPI 同比涨幅超出市场预期，达到 4.2%，而中国 CPI 通胀率仅为 0.9%，但是中国 CPI 通胀率会不会向美国看齐？



支持我们做出否定回答的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交通项目涨幅更高、占比更大。在疫情冲击下，中、美的 CPI 上涨结构的共同点是，交通项目均为大类中涨幅第一的分项。其中，4 月美国的交通项价格涨幅为 14.9%，以占到美国人口 92% 的城市 CPI (CPI-U) 作为总体 CPI 的近似，则美国的交通项目占比为 15.2%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因此，4 月美国 CPI 涨幅的 4.2 个百分点当中，交通一项就贡献了 2.26 个百分点。而中国的同口径交通项 (剔除通信) 占比约为 7% 左右，价格涨幅大约为 5.8%，因此这一项仅贡献了中国 CPI 涨幅中的 0.4 个百分点。所以，仅交通项目一类就解释了中美之间通胀率分化的 1.86 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的交通项目涨幅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暂时性。

第二，与中国相比，美国服务类价格对 CPI 通胀率贡献较大，这可能与美国劳动力就业意愿下降有关，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较美国更小。4 月美国 CPI 当中的服务 (不含住房租金) 类价格同比增速 3.2%，涨幅位列所有分项第二位。结合估算的权重进行计算，该项贡献了 4 月美国 CPI 涨幅中的 0.8 个百分点。相较而言，中国的 CPI 服务项 4 月涨幅仅为 0.7%，虽然与美国不含住房租金的口径不完全匹配，但也可以看到中美服务类价格涨幅存在显著差异。这项大约解释了中美之间通胀率 0.5 个百分点的差异。而且，随着前文提到美国救助个人的政策在 9 月到期后大概率将停止。因此这方面的因素也将使得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上升，并起到压低服务类价格涨幅的作用。因为对个人救助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中国在这方面的物价压力较美国更小。

当前，中国内需仍然明显偏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具有暂时性，以及考虑到猪肉价格正在显著走弱的结构性因素，所以通胀并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外需在将来可能出现的调整和回落，以及过度依赖外部需求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多转向关注内需的修复进程。当前我们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需要与长期的新发展格局相结合，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使得经济恢复的底盘更加稳固。

(来源:《财经杂志》，作者: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